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A Theory of Auto /Biography
传记文学理论

Zhao Baisheng

赵白生 著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记文学理论 /赵白生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8
(传记文学研究丛书·1·)

ISBN 7-301-06517-5

I. 传... II. 赵... III. 传记文学-文学理论 IV. I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7454 号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北京大学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经费资助。

书 名: 传记文学理论

著作责任者: 赵白生 著

责任编辑: 范一亭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517-5 /I·064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4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8.625 印张 220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引言 “吾丧我” :传记记传	1
第一章 传记文学的事实理论	5
第一节 传记事实：“心灵的证据”	5
第二节 自传事实：“我与我周旋”	14
第三节 历史事实：“真相与想像”	26
第四节 三维事实：“自传是别传？”	32
第二章 传记文学的虚构现象	42
第一节 传记文学虚构的本质	42
第二节 传记文学虚构的成因	52
第三节 传记文学虚构的形态	70
第三章 传记文学的结构原理	83
第一节 身份的寓言	83
第二节 影响的谱系	110
第三节 整体性原则	119
第四章 传记文学的阐释策略	135
第一节 使命书 :制度性自我	135
第二节 非我篇 :否定的隐喻	148
第三节 心理说 :理念幻想曲	163
第四节 时势论 :英雄无心影	174

第五章 传记文学的经典诉求.....	200
第一节 新传记的三板斧.....	200
第二节 文学史的忏悔录.....	216
结 语.....	229
参考书目.....	232
大事年表.....	253
后 记.....	271

引言 “吾丧我”：传记记传

传记文学 魅力四射。她的文学价值、历史意义、心理效用和教育功能 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如此 她的重要性才日益被人认识。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指出：“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1〕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认为 传记的作用应该在历史之上。他说：“确切地说 没有历史 只有传记。”〔2〕大诗人叶芝(W. B. Yeats)对传记更是推崇备至。他以不朽的诗才给传记文学下了一个非凡的定论：“一切知识皆传记。”〔3〕

在中国,《史记》的影响个案不胜枚举。传记文学的重要性早已被文化转型期的先驱人物所认识。梁启超对传记文学可谓一往情深,他的大量传记影响巨大。郭沫若在自传里写道：

那时候的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4〕

胡适是另一位不遗余力地为传记文学鸣锣开道者。他除了自

〔1〕 Thomas Carlyle, *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 Vol. 2, Centenary Edition (London, 1895), p. 50.

〔2〕 Ralph Waldo Emerson, *Essays* (Boston, 1925), p. 10.

〔3〕 W. B. Yeats, “Introduction to The Resurrection,” *Explorations* (London, 1962), p. 397.

〔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21页。

己动手写传记之外还不断劝别人写自传,这是因为他深深地认识到传记文学的价值——“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1〕

尽管传记文学如此重要,可是传记文学的研究却严重滞后。从国外情况来看,传记文学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传记文学的写作。20世纪初,卡尔·范·道伦(Carl Van Doren)指出:“传记这块领地,批评几乎毫无涉足。”〔2〕半个世纪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改观。詹姆斯·克理伏(James L. Clifford)在《作为艺术的传记》一书的序言里写道:“跟诗歌、小说和戏剧不同,传记从来没有成为精深的批评研究专题。”〔3〕直到80年代,伊拉·布鲁斯·奈达尔(Ira Bruce Nadel)仍然面对着同样的事实:“批评……对传记的风格、结构或语言鲜有论述。”〔4〕不过,对于这三位研究者所描述的现状,有两点需要补充。首先,在传记文学的研究领域里,对传记文学史的研究出过一些专著。有的研究成果,如乔治·密硕(Georg Misch)的自传史研究,甚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传记创作谈纷纷发表。但正如范·道伦、克理伏、奈达尔所说,学术意义上的批评研究几乎是空白。最近二十年,国外传记文学研究异常活跃,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传记文学的研究严重失衡。研究专著基本上一边倒,自传研究空前劲猛,而传记研究却门庭冷落。此外,日记、书信、年谱、忏悔录、回忆录、谈话录、人物肖像、人物剪影、人物随笔等依然少人问津。传记文学的家族谱系如此庞大,不全面研究这个谱系,我们的理论就难臻完

〔1〕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初版,1941年七版,第6页。

〔2〕Carl Van Doren, “Biography as a Literary Form”, *Columbia University Quarterly*, 17(March 1915), p. 180.

〔3〕James L. Clifford, *Biography as an A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ix.

〔4〕Ira Bruce Nadel, *Biography: Fiction, Fact & For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84), p. viii.

善。所以,传记文学仍然在召唤它的“亚里士多德”。〔1〕

我国的传记文学研究目前处于草创阶段。尽管胡适、梁启超和朱东润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开设过传记文学的课程,但遗憾的是,凭他们的影响,却没有能够造就出一批传记文学研究的专门人才。80年代初,唐弢就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几十年匆匆逝去,传记文学依旧是学术方面薄弱的一环。”〔2〕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填补了一项空白,结束了我国到1992年“还没有一部传记文学史”的历史。〔3〕但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仍然没有大的突破。在写《传记通论》时,朱文华说,他“每每苦于找不到集中和系统的论述传记理论和写作问题的参考书”。〔4〕杨正润在《传记文学史纲》里写道:“现代意义上的传记研究当时在我国几乎是一片空白”。〔5〕在总结近十年来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时,俞樟华和邱江宁指出:“在创作繁荣的背后,关于传记文学理论的研究,却相对冷落,严重滞后。”〔6〕如果总结一下我国目前的传记文学研究的话,我们看到,传记文学史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相继出版的专著有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1992)、杨正润的《传记文学史纲》(1994)、李祥年的《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1995)、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1999)和张新科的《唐前史传文学研究》(2000)。〔7〕但传记文学理论的研究还需要

〔1〕 David Novarr, *The Lines of Life: Theories of Biography, 1880 - 1970* (West Lafayette,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xi.

〔2〕 唐弢:《晦庵序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页。

〔3〕 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页。

〔4〕 朱文华:《传记通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8页。

〔5〕 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9页。

〔6〕 俞樟华、邱江宁:“近十年来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概述”,《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陈兰村、叶志良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1页。

〔7〕 张新科的专著虽然“不再详细勾勒发展的线索”,但“把重点放在发展规律的探寻上”,不妨说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史传文学史。见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大量的奠基性工作。汪荣祖的《史传通说》中西会通,古今兼说,堪称范例。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几年涌现了四部引人注目的专著。韩兆琦的《中国传记艺术》(1998)、俞樟华的《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2000)、李战子的《语言的人际元功能新探——自传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2000)和郭久麟的《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2003)。此外,王成军、许德金、杨国政、全展等都发表了系列论文,专著不久可望问世。

每个行业多半有自己的“三字经”。传记文学的“三字经”是什么呢?

“吾丧我”?!

这三个字几乎隐含了传记文学的全部禅机。机锋虽然不能一下子参透,但写一本书作为入场券,是有实悟之心的。传记文学眼里只有传主,但传主心里有没有传记文学,这是要留意的。吾我抛尽,传记文学见。

写下这点,权当引子,目的是为了切入正题:传记记传。

第一章 传记文学的事实理论

第一节 传记事实：“心灵的证据”

事实是界定传记文学的一个关键词。小说、戏剧和诗歌之所以被划分为虚构性作品，而历史、传记和报道则属于非虚构性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对事实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叙述策略。小说家可以把自己的小说刻意写成曹雪芹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也有权像杨绛那样在小说的“前言”里“郑重声明”：

小说里的机构和地名纯属虚构，人物和情节却据实捏塑。我掇拾了惯见的嘴脸、皮毛、爪牙、须发，以至尾巴，但决不擅用“只此一家，严防顶替”的产物。^{〔1〕}

相反，传记作家就不能享受这样的特权。对他来说，凭空“虚构”地名和机构是不可思议的，随意“捏塑”人物和情节触犯了传记文学的大忌，更谈不上“掇拾”各个部位来冒名“顶替”，张冠李戴。不可否认，“小说家言”与“传记之道”有共通之处，但从事实这个角度出发，它们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马克·萧芮(Mark Schorer)既写过小说，又做过传记。对于两者的不同，他体会尤深：

当一位小说作家转向传记写作时，他会立即发现它们的差异(随后，他也会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点)。作为一个小说作家，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作为一个传记作家，不妨说他是戴

〔1〕 杨绛：《洗澡》，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页。

着锁链写作。小说家甚至在以真人真事为依据时也可以编造内容,而且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处理这些内容。传记作家给定了内容,他必须与事实严丝合缝。当然,这是一个负担,可是他常常发现,这个负担也是乐在其中。因为事实可能会变得异常友好,它们常常富于雄辩,甚至隐含着诗意。或许,这是想像的虚构所望尘莫及的。〔1〕

传记作家“必须与事实严丝合缝”,也就是说,传记作家所戴的“锁链”不是戏剧作家的三一律,也不是律诗诗人的形式规定,而是一条事实的“锁链”。

传记文学建基在事实之上,这点共识经过批评家的论述而成为定论。在《批评的剖析》里,诺斯若普·费耐(Northrop Frye)认为,传记是“事实的作品”,而不是“想像的”的产物。〔2〕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我们仅仅满足于用事实来描述传记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发现这样的概括相当笼统。非虚构性作品里的其他文类,如新闻报道、历史著作等,也都用事实说话。换言之,我们并没有触及传记里事实的本质。社会学家爱弥尔·杜克海姆(Emile Durkheim)为了寻求社会学自身的原理,非常重视对“社会事实”的界定。在他看来,如果什么事实都划归在社会学的名下,那么“社会学将会失去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它的领域就会跟生物学和心理学混为一谈”。〔3〕同样,史学理论里对“历史事实”的不断定义表明,历史学家对自己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相比之下,大多数传记作者和学者却相当惘然。他们铁鞋踏破去

〔1〕 Mark Schorer, “The Burdens of Biography”, *Biography as High Adventure*, ed. Stephen B. Oates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6), p. 78.

〔2〕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45.

〔3〕 Emile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ed. Steven Lukes, trans. W. D. Hall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2), p. 50.

搜寻事实,绞尽脑汁地论证事实,煞费苦心地叙述事实,但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他们往往对与自己日日为伍的事实认识不足。他们几乎没有人像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那样把自己的事实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那么,传记作家和传记批评家所面对的事实是什么呢?

传记事实。

传记事实与传记材料相互关联,但本质上却不是一回事。一视同仁地对待这两者,而不能够把它们丁是丁卯是卯地分开处理,是传记文学创作和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误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不少,但其中关键的一条原因是,传记作者和研究者没有把传记的自主性放在首位,常常有意无意地用传记来为某个目的服务。梁启超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在历史这个大框架里来论述传记,实际上明确地给传记内定了位置:传记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分支。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有一章概论五种专史,而作为“人的专史”的传记则是其中的一种。在“人的专史”里,合传、年谱、专传和人表又不加区分地平行而列,各占一章。一般来说,年谱和人表以传记材料见长,而合传和专传则是传记事实的结晶。梁启超虽然偶尔提及年谱和传记之间的差异,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他对传记资料的一贯态度。如果我们具体落实到他的“专传的做法”,并把其中的“孔子传的做法”作为个案,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对他来说传记材料的重要性几乎是压倒一切的。尽管梁启超声称“做《孔子传》的头一步是别择资料”,^[1]但实际上这也是他传记做法的最后一步。通观全文,梁启超丝毫没有跃过这头一步。他先讲如何别择孔子言行方面的资料和采取资料的原则。对于那些制造孔子神话的伪材料,梁启超不忍丢弃,建议收录在《孔子传》正文之外的《附录》里。在言的方面,他详细论述了六经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47页。

里哪些部分可以入《孔子传》。至于选择的理由,他承认“也无标准,只好凭忠实的主观武断”。〔1〕接着,他讨论六经之外拣取传料的标准。最后,他说:

今天只讲别择资料的方法,其实作《孔子传》的最困难处也在别择资料,至于组织成文,如何叙时代背景,如何叙孔学来源,如何叙孔门宗派,这无论叙什么大学者都是一样.....〔2〕

不难想像,在这样的传记做法指导之下写出的只能是《孔子学案》,而不是生龙活虎的《孔子传》。梁著《管子传》就是这种做法的一个范例。传记资料应有尽有,而传主个性了无踪影。究其原因,只看重历史学家的搜求考证资料的功夫,而忽略传记作家点铁成金的写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传记事实的发掘和打磨无疑是关键的一环。

“一个真正的传记作家”,乔治·圣兹伯里(George Saintsbury)指出:

不应该满足于仅仅展示材料,不管这些材料编排得多么精确有序。他的功夫应该用在回忆录、书信、日记等等材料之外。作为一名有造诣和才智的艺术家,他应该把所有这些材料在头脑里过滤,然后再呈示在我们面前,不是让我们只见树木,而是让我们看到一幅完整的画,一件作品。这是纯粹的一堆细节和素材所无法比拟的。〔3〕

圣兹伯里的这段话当然不是针对梁启超有感而发的,但它却击中了保罗·缪里·肯道尔(Paul Murray Kendall)所说的“巨型传

〔1〕《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155页。

〔2〕同上书,第157页。

〔3〕George Saintsbury, “Some Great Biographies”, *Macmillan's Magazine*, 66 (June 1892), p. 107.

记”(behemoth biography)的要害。这类汇编式传记对材料细大不捐,收罗无遗,但它们充其量也不过是“传记的研究而不是传记”,因为它们“日益屈服于事实”。〔1〕

不可否认,“屈服于事实”的传记材料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年谱、人表、名人录、国家传记和传记词典等因为它们的信息服务功能而成为图书馆的常备军。它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尽量把各类事实实事求是地收罗汇编在一起。客观、准确、全面是它们的准绳。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国家传记词典》里的培根词条。而它与约翰·奥卜锐(John Aubrey)《简传》里的培根形象大异其趣。在《国家传记词典》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板一眼的内容,有条不紊的秩序,五脏俱全的罗列。但是我们感受不到任何生命的气息,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人的化石,而不是血肉毕露的原形。奥卜锐却不同。在他的笔下,培根有一副“蝥蛇的眼睛”。他的餐桌上必备“香草野花”,他说它们确实能够提神益智。他心爱豪宅美院,俊奴靥仆,可他一旦在朝廷失宠,这些人都作鸟兽散。他把他们比作“屋倒害虫飞”。“有人告诉他阁下是打量左右的时候了。他回答,我不打量左右,我打量上面。”〔2〕

这里,传记材料和传记事实的分野判若云泥。那么,什么是传记事实呢?

权威的论述没有直接涉及传记事实这个术语,但吉光片羽往往闪烁出难得的洞见。富有哲学眼光的普鲁塔克(Plutarch)对传记里如何选择事实成竹在胸。在他看来,

人的品德和劣迹并不总是体现在他们最杰出的成就里。
相反,跟最大的围攻或至关重要的战役相比,不太显眼的行

〔1〕 Paul Murray Kendall, *The Art of B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85) pp. 131-132.

〔2〕 John Aubrey, *Aubrey's Brief Lives*, ed. Oliver Lawson Dick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pp. 9-12.

为 ,片言只语 ,一句玩笑却常常揭示出一个人的真实性格。〔1〕

这里 ,我们不难看出普鲁塔克在选择事实时的倾向。他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历史的“西瓜”和传记的“芝麻”之间的功能性差异 ;“芝麻”往往会成为打开性格之门的钥匙。这个观点在 18 世纪的英国文坛盟主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那里得到了回应 :

传主的某些表现和事件会给他带来世俗的伟大 ,但传记作家的任务不是动不动就去浓墨重彩地描绘这些表现和事件 ,而是应该把心思放在家庭私事上 ,去展现日常生活的细枝微节。这里 ,外在的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没有了 ,只有人和人之间谨慎和品德的砥砺。〔2〕

普鲁塔克和约翰逊虽然没有像梁启超那样写过传记做法 ,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传记作品相当忠实地体现了他们的传记观。他们大刀阔斧地劈出了传记里事实的畛域 :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 ,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 ,流芳百世的经典作品 ,而是“一句玩笑” ;“片言只语” ;“不太显眼的行为” 。对于这些“日常生活的细枝微节” ,弗吉尼亚·吴尔夫(Virginia Woolf)别具慧眼 ,意识到它们的一份平凡具有难以磨灭的价值。她在几篇传论里对传记里的事实反复论辩 ,并希冀以此厘断传记和小说的楚河汉界。她说 ,传记的基本特征就是它“必须以事实为根基” ,而“传记里的事实是指那些除了艺术家之外还可以由别人来证实的事实”。〔3〕不同于小说的想像世界 ,传记的事实世界更能触发想像力 ,因为传

〔1〕 Plutarch ,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 trans. John Dryden (New York : Modern Library ,1932) , p. 801.

〔2〕 Samuel Johnson , *Rambler* , No. 60 , 13 October 1750.

〔3〕 Virginia Woolf , “The Art of Biography” , *Atlantic Monthly* , 163 (April 1939) : pp. 506 - 610.

记里的事实是那些“创造力强的事实,丰润的事实,诱导暗示和生成酝发的事实”。〔1〕

这些是什么事实?吴尔夫没有进一步地阐述,也没有更深一层地界定,但是她的纲领性论述睿智逼人。在她的“诱导暗示”下,我们很难不接着往下走,把传记里的事实弄它个水落石出。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我们不妨说吴尔夫所说的种种事实应该是传记事实。

在我们明确界定什么是传记事实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两部传记的实例。这也许可以避免徒有事实之论,而没有事实之实。《史记》是别择传记材料和传记事实的典范作品。韩兆琦的论述极为精辟:

司马迁搜集材料是很辛苦的,但使用材料却不多是多多益善,他着力于突出人物的性格,写出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东西。例如写蔺相如,他抓住了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件事;写魏公子,他突出了请侯嬴和盗符救赵两件事;写田单他只写了火牛阵一件事。这些人并不是没有其他事情可写,例如田单后来当了齐国宰相,还当过赵国的宰相,但是司马迁都没有写,他认为使田单永垂不朽的是火牛阵,而不是当宰相,他认为要突出这几个人物的性格和精神气质,有这几件事就足够了。〔2〕

同样,司马迁在《管晏列传》里也是把重点放在鲍叔与管仲的交谊和晏子御者的妻语等两三事实上。对于自己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司马迁解释得非常清楚: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

〔1〕 Virginia Woolf, “The Art of Biography”, *Atlantic Monthly*, 163 (April 1939): pp. 506-610.

〔2〕 《中国传记文学史》,第92页。

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1〕

确切地说,司马迁所说的“轶事”就是传记事实。

无独有偶,西方的普鲁塔克也深谙选材三昧:

在《亚历山大传》的序言里,普鲁塔克同样表达了歉意,因为他没有写尽两位英雄所有的著名行为。不过,他添了一句:“我不是在写历史,我写的是传记。”……他这里所提到的那种历史,他在别处称之为“正史”,那种“准确记录事件的细节”的历史。相反,普鲁塔克删略正史的内容,凸显能够揭示人物性格的事情。普鲁塔克把它们叫作“心灵的证据”(《亚历山大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和最美丽的事情”(《伊米流斯传》)和“值得铭记的事情”(《特修斯》与《罗默流斯》比较论)。〔2〕

普鲁塔克回避“正史”的内容,跟司马迁的“论其轶事”,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因为“轶事”就是指“世人不大会知道的关于某人的事迹,多指不见于正式记载的”。〔3〕他们往往舍历史的大道不走,另辟蹊径。除了各自高远的写作追求之外,他们都本着一个朴实的愿望:写出那一点点属于人的东西。因此,他们的传记有了相同的切点:“轶事”和“心灵的证据”。名称虽然不同,但所指却是一回事——传记事实。

在传记事实的选择上,普鲁塔克匠心独运。这体现在《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多数篇章里,但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埃尔西巴厄迪斯

〔1〕司马迁:《史记》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36页。

〔2〕C. P. Jones, “Plutarch”, *Ancient Writers: Greece and Rome*, ed. T. James Luce (New York: Scribner, 1982), p. 972.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95页。

传》(Alcibiades)。普鲁塔克做传时有自己的道德准绳,而这位将军出身的政治家显然不合他的理想,但个人的道德观并没有让他戴上墨镜,专拣性格的污点开刀。一方面他皮里阳秋,另一方面他又能绘事若衡。他的突出长处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下面的两段文字里:

时乖命蹇,风来运转,他的行为会随之而前后不一,变化无端。可是他真实性格里的主导激情还是一种出人头地的雄心和愿望。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几件轶事里的言辞说明了这一点。摔跤时,他一看自己大势已去,又害怕被摔得四脚朝天,就把对方的手放在嘴里,使出浑身的力气咬了一口。对方立即松手,说道:“你咬人,埃尔西巴厄迪斯,像个娘们。”“不,”他回答道,“像头雄狮。”〔1〕

第二则轶事显示了他性格的另一面:

埃尔西巴厄迪斯花了七十个迈纳买了一条狗。这条狗非常高大,极为标致。尾巴是它的主要装饰物,可埃尔西巴厄迪斯叫人把这条尾巴砍了。为此,熟人们惊叹不已,告诉他全雅典都在为狗喊冤,大家一致声讨他,要他做个解释。埃尔西巴厄迪斯哈哈大笑,说道:“我想要的事正好发生了。我希望雅典人谈论这件事。这样,他们就不会去谈我那些更糟糕的事了。”〔2〕

在《传记史纲》里,卫尔伯·克罗斯(Wilbur L. Cross)认为:“普鲁塔克所关心的只是他笔下人物的个性。”〔3〕约翰·噶拉笛(John A. Garraty)对此也有同感:

〔1〕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p. 234.

〔2〕 Ibid., p. 238.

〔3〕 Wilbur L. Cross, *An Outline of Biography: From Plutarch to Strache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4), p. 6.